

临汝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情况(下)

●张清杰



领导建立临汝抗日政权的工作，主要是孔祥祜同志做的。大峪店那里有个保长叫孔宪章，是个富户，约50多岁，人倒不坏，他的外号叫“套裤”，同孔祥祜同志攀本家，他的儿子叫孔庆祥，按祖谱比孔祥祜大一辈，当时，年龄20来岁，一直对我们很亲近，后来参加了革命，解放后我还听到过他的名字。

部队进入大峪店后，立即召开各界代表大会，宣布成立临汝县抗日县政府。李聚五留下来的自卫队，重新整编为我们的地方武装，共有三个中队，即王天一、秦广善、张玉林中队，赵德修中队是以后成立起来的，郭钊有十几个人，据守一方，住在自己村里，没有算在内，他们这些人都是吃公粮的。

党峰同志任县长，全县管辖面积约有一百二、三十平方公里，县政府临时凑合了几个人办事，都是当地人，没有北方来的老同志。县政府成立起来后，孔祥祜和五团都走了，留下一个连（一连），让我们几个同志支撑这里的局面，党峰同志住在大峪店西边约十里外的马鞍驹村于培周家里，董逢甲同志是于培周的妻弟，于善佑同志是于培周的长子，经常跟党峰同志在一起活动。

临汝抗日县政府的成立，很快成了日本人、国民党游击队（如登封县的杨香亭等）、国民党官匪（如黄万镓等）进攻的目标，若非内部团结一致，实难应付当时的局面。如张玉林中队长接到杨香亭给他的联系信后，找秦广善联络，准备对我们下手，秦把他们训斥了一顿，并马上告诉我：“你要注意，张玉林和杨香亭联系上了”。当时杨香亭给张玉林写信说：“八路军是外地人，不久就要跑掉了，咱们是本地人，不要跟他们，我们是代表中央，代表政府，我们占领大峪店，我们就是政府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发展武装力量，一定对得起你。”秦广善给张玉林说，“你不要脚踏两只船，共产党、八路军得人心，杨香亭能站得住？脚踏两只船，将来性命难保。”于是我们共同研究了挽救和控制张玉林的对策，才没有出大问题。

大峪南边山下，有个大土匪头子，名叫焦道生，手里约有七、八百条枪，号称两千人。他曾到密县、登封一带拉过游击（土匪）发了横财。焦道生派人到大峪店以南十几里的地方拉肉票、抢牲口，闹得老百姓无法过活，纷纷找我们想办法对付焦道生。我派秦广善给他送去一封信，说明为了抗日，我们不打他，还可以交朋友，但必须把抢走的东西全部送还老百姓，以后再不准来扰乱我们的地区，如果不然，我将带部队进入焦村，把他全家房屋炸为平地。这时，他家正在兴建楼房，他父亲已七十来岁了，听到这消息，每天哭叫着骂他，说他给家里惹祸了，全家人吓得夜间不敢睡觉。他们每天都在准备着我们去打他们（他估不透我们的力量），加上秦广善过去也是干这一行的，故意吓唬他们。他很快托人送信来，完全答应我们的要求，还苦苦请求我去他那里一趟，愿和我结为生死之交。有一天我去了，他大摆宴席，把几十个中队以上的土匪头子集合起来，听我讲话。从此，他那里变为我在山下活动的落脚点，我去过焦道生那里十多次，每次都有老同志和我一道去，如张静同志是老同志，解放后任河南粮食学院院长，还有王才贵同志，是老指挥员，解放后是河南军区副司令员。有一次（约1945年5月）我还陪同王树声司令员、戴季英政委、孔祥祜同志到了焦村，在焦道生家住了一天。

我在大峪店的公开身份是“张秘书”，孔祥祜同志叫“孔参谋”，我们俩的职务不是上级任命的，而是为了便于对外活动，都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，表示我们都是司令员的亲信，但是遇事又不作具体答复。

我们在大峪店几个月时间，打了许多仗。第一次是打退了黄万镓的侵犯。1944年12月份，黄万镓带领三百多人进犯大峪店。当时，秦广善只是名义上归顺我们，但仍存有二心。黄万镓暗中找到秦广善，让他给我们带信。黄万镓提出想到大峪店街来，一不占领大峪店，二不抢东西，看看就走。考虑到根据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我们事先把武装力量布置在大峪店的西山上，黄万镓一进来我们就打起来了，机枪、步枪够不着打，就用迫击炮轰（迫击炮是国民党军队逃跑时留下来的）。黄万镓见势不妙，仓皇撤退。

第二次战斗大约发生在1945年1月份。有一天，盘踞在禹县的日本鬼子，夜间埋伏在大峪店的东山上，准备偷袭大峪店。第二天天刚亮，有

几个驮煤的群众急急忙忙跑来说，日本人来了，在山上没有下来。当时，我想把两个中队布置一下，可是王天一夫妻弟不听我的话，他大喊一声：“走呀！打老日去呀！”随即有三四十个人跟着他向山上跑去，我恐怕出问题，马上派通讯员去传张玉林，命他大雄山（大鸿寨山）南坡往东打，王天一中队在大峪店东面往东打，两面包抄日军。王天一中队所在的山头离日军三百米左右，中间隔着一条沟，太阳出来了，日军都在山坡南崖上躺着晒太阳，我们突然向敌人开枪射击，打得敌人措手不及。由于我们两边夹击，敌人不敢向前进攻，两军相持一天，天黄昏时，才撤下来。这次战斗，打死很多日本人，我们没有伤亡，受到了皮司令的表扬。

第三次战斗约在1945年春节前后，登封匪杨香亭以一个团的兵力进犯大峪店。杨在进犯大峪店之前，给张玉林送了信，叫他做内应，我们设法控制了张玉林，他的阴谋未能得逞。敌人占领了大峪店东北的大雄山、蜜腊山、老婆寨及登封县的白栗坪一带。我们正规部队的一个连撤到大峪店，配合我们地方武装进行反击，用迫击炮对准大雄山一连轰了好几发，杨香亭就惊慌失措命令部队撤退了。当杨香亭的队伍撤到登封境内一条山沟时，恰巧遇上了皮司令带的部队，当即把敌人包围起来消灭了大半，杨香亭狼狈不堪地逃跑了。

第四次战斗是反击登封县日本人的扫荡。他们扫荡的目标是棉花窑、郭沟、大峪店等地。当时，我们的队伍布置在棉花窑的南边山上，日本鬼子一到棉花窑，就打了起来，鬼子招架不住，退到郭沟，郭沟就是郭钊的家，郭害怕鬼子抢他家的东西，带二三十个人，光着脊梁，硬和鬼子拼。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，打死鬼子几个人，他们看到大峪店去不成，就狼狈地撤退了。

王树声司令员到大峪店以后，我们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部队还打过几次仗。

第一次是禹县的日本人和伪军席子猷进犯大峪店，王树声司令员亲自指挥三支队（陈先瑞）和一支队方胜普副司令员带的两个连，反击日本鬼子的进犯，我们临汝县的几个中队都参加了，主要任务是抬担架、送伤员、搞支援工作。

第二次是皮、徐主力部队攻打禹县的上、下官寺，围歼日伪席子猷。这次战斗我们也参加了，打死打伤日伪军很多人，席子猷带领少数人突围逃跑了。皮、徐支队赶到神屋，乘势把神屋解放了。皮、徐来到大峪店，任命我为箕山区情报处长，主要任务是掌握临汝周围五六个县的

情报工作，并派我到山下同各土匪武装联系，以八路军秘书的名义进行统战和情报活动。我在临汝县东边去过很多地方，唯独没有去过黄万镓那里，因为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派来一个特务头子，叫“王委员”，住在他家里，黄是官匪，不是土匪，我要去就等于是给他送情报。他为了掌握我们的情报，曾几次请我去，我都拒绝了。有一次，他听说我到焦道生那里去了，他跑去同我见面，我们只是一般性地谈了谈，他喊的抗日口号比谁都高，而且表示坚决相信共产党，可他却凶狡狡诈，杀过不少共产党员。他的人不多，约三百多人，多数是日本人以前跟随他的兵，当时我对他很有戒心。

1945年2月底3月初，洛阳、郑州、许昌等地的日军调动频繁，引起了住在巩县南边大山上的王树声从延安带来的两个支队以及皮、徐支队首长的注意。据此情况，大家估计日本人要集中兵力围剿我们。王树声等领导同志同意、徐商谈行动计划，皮的意见是先把我来，让我汇报一下敌人调动情况和意图，再作定论。他们连夜派人到大峪店，把我叫到司令部（大峪店的郭钊也随我去了），立即向王司令员汇报敌人的大调动是在组织力量攻打南阳，不是围剿我们。王树声同志掌握了这一情况后，认为巩县山不大，况且距郑州、洛阳较近，不宜活动。他问我：“司令部住在哪里合适？”我说：“还是到临汝县的大峪店去，那里山大林深，离敌人较远，比较安全，同时对周围几个县敌人的情况也较了解。”他同意了我的意见，于是，就带领陈先瑞、张才千两个支队到了大峪店，后来很长时间他们都住在这里。3月间，箕山区撤销了，由皮、徐直接领导原箕山区和嵩山区。整个豫西地区建立了六个支队，王树声任纵队司令员，住临汝县的大峪店；一支队司令员皮定均，司令部住巩县，活动地区是临汝县大峪店以北直到登封、偃师、巩县一带；二支队司令员韩钧，他的活动地区在洛阳、新安、渑池以北到黄河边；三支队司令员陈先瑞，在舞阳、叶县一带活动；四支队司令员张才千，在大峪以东，禹县境内活动；五支队司令员闵学圣，他的活动地区在宜阳，司令部在东赵堡张剑石那个村子里，张是专员；六支队司令员刘昌毅，他住在禹县神屋，活

动在郑县、襄县、宝丰一带。

1945年3月，河南军区成立了三个办事处（即情报处），第一办事处由孔祥祜同志负责，住巩县皮定均司令部；第二办事处由我负责与孔同住皮部；第三办事处由张剑石负责，住宜阳东赵堡闵学圣司令部。

1945年5月，王树声带领陈先瑞、刘昌毅两个支队，到伏牛山去开辟新区。我和孔祥祜同志都去了，在临汝县东南的虎头街过了汝河。夜间，日伪团长马安良出来接待我们，还请我们吃了一顿饭。次日，我们到达临汝县城南蟒川乡庙村刘波涛的家。刘是同我一一道来豫西的华北干部，我对他比较熟悉，他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，后到晋察冀一分校，1939年秋毕业后，任分区农会主席。南下时，他随皮、徐部队回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，他在一支队没有正式职务。这次开辟临汝县城南边山区根据地，地方工作由他负责。他父亲是个绅士，有50多岁。当时我们就在刘波涛家里建立了抗日县政府，孔祥祜任县长，刘波涛任副县长，还宴请了许多绅士，出布告购买粮草等。我们到这里的目的，为的是给刘昌毅、陈先瑞支队找个活动地区，准备建立根据地。但是后来上级领导考虑到那里太狭小，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合部，不利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，约有一个礼拜时间，就住嵩县去了。

1945年6月，军区决定六支队（刘昌毅、张力雄支队）开辟郑县一带根据地，把四支队的神屋镇划归他们作为基地，我和孔祥祜同志一同去了。我们到郑县自卫队那里去了几次，成立了禹县抗日政府，张立治（张力之）任县委书记，我任县长（兼），刘盛斌任独立团长，孔祥祜任专员（就管我们一个县），8月，日本鬼子投降后，我们又在这里停了两个月，就撤出了豫西。

（张清杰，男，1919年生，河南省许昌县槐洞镇人。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4年10月任中共临汝县委副书记兼箕山区情报处长，着重抓统战工作。1945年6月任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。解放后，张清杰调中共中央中南局城工部任处长。1954年调北京石油工业部任采油处长、采油厂厂长、川中矿务局副局长等职。1969年任石油工业部勘探司副司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任石油科技情报所所长。2012年11月逝世，享年93岁。该文根据张清杰的回忆录资料整理而成。）

（文章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）

女 娲 洞

汝州与登封交界处，山中有座女娲洞，又叫女娲宫。传说是老始祖女娲娘娘在这里居住创业的地方。

很久以前，伏羲、女娲兄妹二人，带领部族来到汝河北部的天熊山。他们看到山下的湖面鱼跃鸟飞，山上鸟语花香，觉得这里是人安家的好地方。于是，就到山上寻找洞穴，找了好长时间还没有找到。就在大伙发愁时，忽听“砰”的一声，石穴洞开。一群红嘴鹰从洞口飞出，飞到伏羲、女娲他们这群人的头顶，高声叫着：“快进，快进，快进，快进！”女娲应声说：“进！”大伙随着女娲、伏羲大胆地向洞里走去。乖乖，这不是一般的山洞，这简直是神仙居住的宫殿。

洞里石壁上，夜明珠光芒四射，石床、石椅、石桌、石碗，还有一股带着烟雾的山泉。中间最宽敞的地方，洞里再套几个洞，能住上几百号人。他们往北又走了老半天，从洞的北口出来，见到了太阳。再回头看天熊山和向北看看嵩山，原来自己穿过的天熊山是顶着天的，比嵩山高得多。莫非这是顶天柱吧？那咱穿过山洞的大厅可能就是地心。女娲脱口说道：“咱来到天地正中间啦！回，快回去，天地之心正好是咱要找的地方，今天总算找到了。”这样，伏羲和女娲就安置大伙在这座洞里住了下来。

女娲娘娘才智超群。她帮助伏羲出谋划策，还身先士卒，杀猛兽，治洪水，提倡以鹿皮和牛羊为礼，实行族外通婚。女娲还用兽皮、兽角、竹苇和葫芦等制成吹、打的乐器。女娲在女娲洞及天熊山周边地区，留下许多创业的传说遗迹。传说洞前娲蚕坡，就是因女娲教人驯蚕而得名。另外，坡中的碓臼窝、韭菜洼、老麻地、小羊圈、饮马槽、牛铺洼、葫芦套、磨刀石，是女娲教人种植养殖的遗迹。女娲洞顶的山尖叫将军帽。传说是女娲给大鸿氏、二鸿氏、祝融氏、葛天氏、九龙氏和大风、二风一些武士们做的将军帽和存放帽子的地方。后来，伏羲为了把汝州他们治世的经验向中原传播，临走前，召开会议，宣布把汝河北和颍河流域封给女娲全权管理。

后人为了纪念女娲，在女娲洞前蚕坡内盖有女娲庙、蚕神庙，后来改名白云观祭拜女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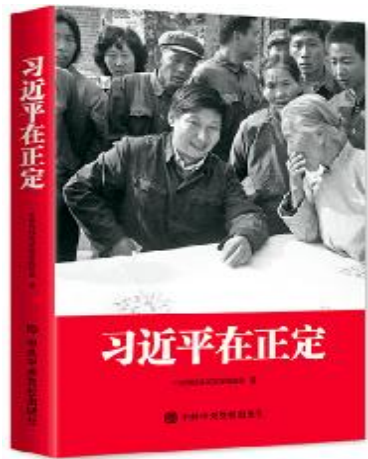
讲述者：王珍 整理者：樊忠义 民间故事



图片摄于2019年12月5日，中央公园云祥湖。 梁杨子 摄

渚清沙白鸟飞回

·连载·



我举个例子，就是关于刹住公款吃喝的问题。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，正定定的这项工作有开创性。如何刹住公款吃喝？习总书记做出规定，机关干部、事业单位干部不准用公款吃喝，单位之间也不准互相宴请。执行一段时间以后，

习总书记发现了新问题：正定要改革开放、要招商引资，客商要来正定投资、置业，来了总是要吃饭的，怎么办？针对新问题，他提出：客商来了可以招待一顿饭，标准四菜一汤，上正定小吃，不准上高档菜，不准上烟酒。这样的规定执行了一段时间，习总书记又发现了问题。人家客商来一两个人、两三个人，单位的陪客七八个、十来个。他认为这样不行，要解决。所以又做了补充规定，规定陪客人数不准多于来客人数。经过一段时间又发现了新的问题。正定在习总书记的领导下，各项事业都有了长足发展，创造了很多好经验，这些经验通过媒体在全国得到传播，影响很大，全国各地来正定取经学习的人很多。考察学习团少的有三五个人、十来个人，多的有二三十个人，这样一来，之前规定的陪客人数又不合适了。习总书记又做出规定，陪客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个，一般两三个人。这项规定出来以后，再由纪检委认真检查各单位执行情况，招待工作就越来越规范了。

按照习总书记的办法，公款吃喝的问题一抓就灵。老百姓也敢反映，真有干部不守规矩，老百姓

肯定就反映上来了。那时候，包括县委常委会在内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很认真，敢于批评别人，也敢于批评自己。习总书记反复强调，一定要做到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。如果从改革角度讲，正像他现

在说的，改革只有进行时，没有完成时。现在习总书记是党的总书记，他在中央抓党风廉政建设也是这样，不是抓一下子就算了，而是坚持不懈抓下去，严肃认真抓下去，“老虎苍蝇一起打”，这和他正在正定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。

采访组：在正定工作期间，习近平同志就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。请讲讲您了解的情况。

张五普：大力抓精神文明建设，是习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一以贯之的。从全国来说，这方面在正定是领风气之先的。当时好多人有片面认识，认为经济建设是中心，精神文明抓不抓不要紧；经济上去了，精神文明自然就好了。习总书记不这么看，他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得很紧。

有一件事情，我印象很深。1984年春天，习总书记提出搞一场全县运动会，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。提出后，好多人不理解，认为体育运动多年不搞了，1958年以来全民体育运动就停了，学生运

动会都很少开，现在搞经济建设，弄这个运动会干啥？没有多大必要。习总书记不这样认为，他反复讲，我们必须“两个文明”一起抓。老百姓“钱袋子”要鼓起来，精神也要丰富起来，身体也要健康起来，让老百姓感到幸福，搞全民运动会这件事情意义重大。习总书记说，咱总得有个开头，开始可能不太完善，也不会尽善尽美，没关系。咱们开个头，以后逐步搞，会越搞越好。

全县运动会如期在正定一中操场举行，有1300多人参加，当时我协助习总书记做这项工作，石家庄地区体委还来了个同志出席，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。习总书记讲话，当时也没个主席台，就站着讲。他说咱们这是第一次全县运动会，一定要开好，要“两个文明”一起抓，老百姓既要富起来，也要健康起来、幸福起来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好这个头，通过比赛达到促进团结、广交朋友的目的。要坚持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，这对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非常重要，大家共同努力把这次运动会搞好。习总书记讲话时间不长，讲得很好。

（未完待续）